

# 中国近代军事史学术讨论会 论文汇编

(三)



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

中国近代军事史  
学术讨论会论文

甲午中日战争战备评析

齐国华

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

一九八六年十一月

## 内 容 提 要

本文评述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临战前，双方在军队整编、武器优劣、情报畅通、运输给养、战机捕捉等等方面差异，进行对此分析。从这些问题中探讨战争胜败的原因。

### 甲午中日战争战备评析

甲午中日战争，是近代史上一次影响巨大的战争，它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，也是日本从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阶段的一个转折点。战争结局的胜败不是偶然的，它包涵着许多复杂的因素。本文仅就临战前中日双方的战备差异作些探讨，对诸如部队整编、武器优劣、情报畅通、运输给养、战机捕捉等等与战争有直接关系的方面作一对比，由此追溯战争胜败的原因。

~ / ~

军队的整编与装备的更新，是战争胜败的关键。“任何战争都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”，① 甲午中日战争也不例外，它是日本资本主义向外侵略扩张政策的继续。从明治时代的“大陆政策”到“征讨清国策”，日本就制定了中国为侵略目标的具体军事措施，首先在部队的整编与装备的更新方面做了充分准备。早在明治二年（1869年）日本便派遣山县有朋、西乡从道等当权人物赴欧美各国考察军情。通过实地考察，日本政府决心学习西方，将原来幕府时代分散的军权统一到中央政府手中来。明治五年（1872年），正式颁布《征兵告谕》，其中规定：“准许世袭坐食之士减其禄，许其脱刀剑，以求世民渐获自由之权。斯乃上下平均，人权齐一之道，即兵农合一之基也。于是士已非从前之士，民亦非从前之民，均为皇国一般之于民，报国之道本应无别。”② 实施了“全民皆兵”，扩大了征兵的范围，为军队续制的“西方化”，即现代化打下了组织基础。到了明治十一年（1878年），又建立起“参谋本部制”，进一步把陆军和海军有机地联系了起来，作战时可以使陆军和海军有一个统一的协调机构。所以，甲午战争前夕，日本的陆军编制基本上已完成改革。据日本松下芳男所著《日清战争前后》中说，当时日本陆军正规部队

① 列宁：《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》。见《列宁全集》第22卷第303页。

② 转引自孙克复、关连：《甲午中日战史》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，第53页。

主要师团的编制是：共有六个师团，如一个近卫团，总计为七个师团。其中包括步兵二十八个联队；骑兵大队二、中队七、小队六；野炮兵七个联队；工兵大队六、中队一；辎重兵六个大队；要塞炮兵三个大队；军乐队一。这是平时正常情况下正规部队编制。一旦战争爆发，情况当然又有所不同了。

武器装备上的更新也是很突出的。一八八〇年新造了“十三年式步枪”（因为那年系明治十三年），统一了原来品种繁多的步枪型号，并加以改进，使陆军的常规武器得到了进一步改善。所以日本外相伊藤博文的密友，英国《泰晤士报》驻东京记者布林克莱说，在甲午战争前夕，日本仅“就弹药而论，它所储存的数量，比在一次对华战争中可能耗去的还要多。”① 海军的装备更是有着较大的发展，战舰都是钢质的，其中如“吉野”号，已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。因此在对中国发起大规模进攻前夜，“日本人在朝鲜的成次已向人们表现出这样的成就，它的‘将军们知道怎样指挥作战，而军队的组织甚至在一个没有良好公路的国家中也能顺利地运筹’”。在整个战争期间，法国、英国和其他外国观察家一再赞许日本人精于战略和战术，赞扬他们有效能的训练、纪律、勇敢善战、集体主义精神，以及他们在运输、军粮供应和医药设施方面的突出表现。”② 可见，日本在向中

① 转引自丁名楠等：《帝国主义侵华史》第一卷，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76页。

② [美]费正清编：《剑桥中国晚清史》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，中国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，下卷，第309页。

国发动侵略的时候，是精心地逐行地进行了部队整编及武器更新的准备工作的。

清朝方面，当时的主力部队是李鸿章的淮军，淮军虽然也进行了“西式操练”，美其名为“新军”，但那是在地方团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，它的编制仍然是湘勇的旧营制，将领中真正懂得新式军事的亦寥若晨星。李鸿章自己也承认：新军“用洋枪者已少、用后膛枪及炸弹者更少，可靖内匪，而不可御外侮。”① 因此，到了甲午战争前夕，他深知力薄势单，意图另招新军。有人认为此策不妥，向他建议：“如果募军，缓不济急，不若飞商江、皖、鄂、豫等省，各借拨数营，随带军装，迅速来津。”② 可见李鸿章的应战，是在仓猝间临时逼迫上阵的。至于海军，虽然有南洋舰队和北洋舰队，但南洋舰队早在中法战争时已一蹶不振，所以这时也是李鸿章掌权的北洋舰队为主力。尽管想“西化”，无奈设备太陈旧，即使作为主力舰之一的“广乙”，竟然是本质钢皮的，当然不堪一击，难怪李鸿章在一八九四年五月间巡阅海军后，忧心忡忡地奏说：“中国自（光绪）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，迄今未添一船，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艘勤如训练，窃虑后难为继。”③ 以这样的实力去匆忙应战，可以说，大部分清军官兵的担心不是多余的。

① 《清史稿》卷139，兵志10。见中华书局1976年版，第14册，第41—28页。

② 《甲午中日战争》（下）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6页。（以下简称《甲午中日战争》（下））。

③ 《李文忠公全集》奏稿，《校阅海军事竣折》，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

从总体来观察，就兵力的数量而言，似乎是清军大大超过日军。当时清军的陆军总人数号称三十六万，而日军却只有二十二万；海军舰艇总吨位数，清军为八万多吨，而日军只有五万多吨。然而打响了的战斗是讲求实效的，透过这些表面数字，揭出内在的具体真相，实情便可大白。先看清方，陆军的所谓“三十六万”，其中既包括八旗、绿营，又包括乡勇，甚至连禁军、守陵兵都囊括在内了。众所周知，八旗、绿营是早就丧失战斗力了，至于乡勇、禁军更是可想而知，而主力淮军已如上述，这便是“三十六万”清朝陆军的实际战斗力。日本方面，表面上数量大大少于清军，但除了正规部队以外，由于平时抓紧训练、故而驻守边防要塞的军士，以及警备、宪兵，只要改编番号，稍加训练，即可参战，而且是“全民皆兵”。其后备兵员也就更为可观了，更重要的是，日军的“而化”程度远比清军为高。以海军而言，总吨位数清军确实比日军大，但如果把每只舰艇单独对比，作战能力的强弱便明显出现差距。日方的“吉野”舰为一八九三年建造，吨位数四千多，炮位三十四门，时速二十三海哩，是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战斗舰。而清军的“定远”、“镇远”，号称“舰大炮重”，虽有七千三百吨，但是一八八〇年建造，就是说要比“吉野”落后十三年，时速为十四海哩半；即使像“广乙”那样的木质钢皮船，也还在当作“主力舰”使用。其他加速度最快的“致远”、“靖远”，时速亦只不过十八海哩，因此在实战中，日本军舰尽量发挥他们快速灵活的优势，致使清军虽有邓世昌、林永升那样勇敢坚强的好管带也是无济于事，终于不免失败。以战斗的组织而言，日军自“参谋本部”建立后，海陆军可以统一指挥，协调作战，而清军却是“陆军与水师规

制各殊，训练亦异，水师犹可陆战，陆军不能操舟。”① 这样看来，中日双方战斗力的悬殊差异，在备战阶段已经陆续形成了。

## 二

在前线作战，军事情报的灵通与否，对战争的胜败往往具有决定意义。日本在这方面的工作也是做得非常及时和充分的，直到临战前，他们还继续不断地派出间谍到中国来，不仅人数众多，而且不择手段，无孔不入，有关清军的动向，他们甚至“比中国人自己更清楚地知道，每一省可以抽调多少人出来作战。”② 尤其是对中国的地理形势，注意更为周密，对东三省、渤海湾等处，竟然通过实地查察，在地图上详细注明了道路和山脉，以便为大规模入侵日军作好“先遣队”的响导准备。

反观清朝方面，当日军已在剑拔弩张，兵势汹汹的时候，西太后却在忙着筹备六十寿庆。光绪二十年正月，她曾数下“懿旨”：“本年大衍庚辰，施恩懋赏，在廷臣工，克勤职守，宣力有年，应一体加恩，以光盛典。”③ 甚至还要“允宣特沛恩论，星延中外。”④ 可见她是把“祝嘏”列为主要大事的，这样的安排，曾引起中下级

① 《清史稿》卷139，兵志10。见中华书局1976年版，第14册，第4128页。

② 见丁名楠等：《帝国主义侵华史》第一卷，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，第276页。

③ 朱寿朋：《光绪朝东华录》（三），中华书局1984年版，第3305页。

④ 同③，第3308页。

官吏的不满，有人私议说：“东事孔棘，听之则失我屏蔽；若因此开衅，又毫无把握，真可□□大者。管见，先请懿旨，暂停庆典，使彼知我有必战之势，然后中间人出为调停，或可转圜乎。”① 还有人建议：“以庆典之款作用兵之费，可谓有胆有识，如蒙照准，将士知所激励，中外停为美谈。”② 这些意见当然传不到西太后手中，即使西太后知道了，也不会采纳。

至于李鸿章，早就决意避战求和，并没有打算把主要精力化在临战前的战备工作上，当日本已经在朝鲜磨刀霍霍的时候，提督叶志超屡请增加兵力，他却答以：“钩署现正与日商，未便遽添大军，致生疑阻。”③ 直截了当地加以拒绝。当光绪帝都“虑兵力不足，因谕缓靖藩服，宜图万全，尚须增调续发，以期必胜。”④ 李鸿章却依然敷衍搪塞，推之了事。他这种消极观望的态度，单从军事策略上考虑，也是极为不利的，当时礼部侍郎志锐就曾指出：“我愈退则彼愈进，我益让则彼益骄，养痈贻患，以至今日，气焰嚣张，贪婪无已。

① 《甲午中日战争》（下），第18页。

② 《甲午中日战争》（下），第59页。

③ 朱寿朋：《光绪朝东华录》（三），中华书局1984年版，第3426页。

④ 《清史稿》卷23，“德宗本纪一”，中华书局1976年版，第4册，第906页。

一误再误，则中国从此无安枕之日。”⑦ 某些外国史学家曾作过这样的分析：“改革朝鲜内政不过是一种借口，日本决意实行侵略，以期树立自己的国际地位，尤其是想谋取中国在朝鲜的优势地位而代之，从而巩固它本身的独立及其今后在远东的地位。”⑧ 而清政府则：“并不是以最大的精力用之于杀敌致果，而是用之于乞求列强的干涉。中国的统治者们指望不须认真努力救治其积弱的原因，而但求借外力以挽救中国免于自食其积弱的后果。”⑨ 应该说，这是比较客观的论断。

朝鲜战事初起，中国电报局频频接到平壤的告急电报：“据平壤局报，汉城至开城电线已为倭损断。……倭兵已到开城，从此天津电报只能到平壤为止。”⑩ 前线持续战斗，消息灵通与否是取得作战主动权的决定因素，日本军队一到前线，首先破坏中国的电报线，迅速切断中国的通讯网络。目的是使清军陷入消息隔膜的被动局面之中。在中国电报局总办、轮船招商局督办、总理后路转运事宜盛宣怀的许多电报中，有这样两封读来令人深思：“有韩民千余人押两倭人来卑局（电报局），执有地图两张，六开洋炮一支。其地图一小张，由平壤至保山海口，卑职亲见所画甚细；一大张用色画，系陆路地图，该

⑦ 《清季外交史料》卷9·2，第17页。

⑧ [美]马士、密亨利：《远东国际关系史》上册，商务印书馆馆1975年版，第38·2页。

⑨ 同⑧ 第39·2页。

⑩ 《甲午中日战争》（下），第71页。

倭人已扯碎，洋炮为韩人拾去。”、“韩民怒将画图倭人送至平局，王梓渝以电局不管公事，推不过问。而韩官亦推不问。”① 电报虽极简单，却充分反映了日本间谍是在出入频繁，不余遗力地配合作战部队紧张活动，而清军却草率大意、麻木不仁。面对已经抓获的奸细，竟然漫不经心，不仅不予严惩，甚至也不深加追究，听之任之。电局固然不便直接处置军队之事，但当地驻军也不主动顾问，予以查察，可见即使在前敌，清军作战各部门亦是各自为政，缺乏联系，更不必说密切配合、协同对敌了。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况，负主要责任的仍然应该是李鸿章，因为日军的间谍活动已非一朝一夕，早在中日正式接仗之前，德商信义洋行经理满德曾经给李鸿章写过报告：“中使在倭未能探听倭国军情，而倭人在中竟能洞悉中国军事。……当满德未抵塘沽时，居然有一倭人久住塘沽，此倭人才具甚大，华、英、德、法言语俱能精通，看其与他人言论间，□□□□并随时用铅笔注载，……及满德坐火车时，又有二倭人同载，满德并未敢与之交谈，则‘爱仁’、‘飞鲸’、‘高升’船载若干兵，若干饷，何人护送，赴何口岸，该倭人无不了如于胸也。”② 清军官吏甚至亲眼目睹日本间谍在肆无忌惮地作案也不上前干预，“飞鲸”船上的买办就感到非常惊异地报告他的所见所闻：“倭夷往来不绝，凡我船开行，彼即细为查探，非但常在码头逡巡，竟有下船在旁手持铅笔、洋簿。

① 《甲午中日战争》（上）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，第11—12页。（以下简称《甲午中日战争》（上）。）

② 《甲午中日战争》（下），第103页。

将所载物件逐一记数。竟无委员。巡丁驱逐。”① 然而，像这些重要的报告却没有引起李鸿章的警觉，既不采取措施严加防范，又不当即立断迅速追查，致使日本间谍活动更加猖獗，给中国的军事行动带来很大损失。其直接后果便是“爱国”、“飞鲸”、“高升”三船装载二千五百名士兵前往朝鲜增援驻牙山的叶志超部队时，由于被隐藏在天津的日本间谍窃取了可靠的情报，即刻“先期电闻”日本军部，致使日军偷袭计划得逞。

在后路运输方面，清军的船只也相当紧缺。即使在平时运输煤炭粮食也全靠见缝插针，调度得当。负责此项重任的盛宣怀曾经写信给开平煤矿督办张翼说：“顷奉惠示，拟派‘北平’、‘富平’两船专运威海之煤，‘永平’一船专运旅顺之煤，‘承平’尚须赴粤装运官煤，目前只可如此办法。惟招商局前蒙俯允，每月拨船运煤二千吨，至此又成画饼，殊为怅然。粤煤运完后，尚祈阁下设法分运，以济急需为祷。”② 为此，张翼也曾多次写信对盛宣怀叹苦经：“以威海、旅顺为海军驻泊紧要之区，每处应屯煤一万吨，以资应用……但如再加吃紧之时，散处租定外船未能到埠，即须仍祈长才设法筹划，应如何拔调别船加运，俾不致贻误要需。”③ 中国离作战前线近于日本，但运输物资却比日本困难，除了运输工具短缺这个物质原因外，事前的准备工作不充分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。

① 《郑观应、陈猷致盛宣怀函》，见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资料“郑观应专函”。

② 《甲午中日战争力（下）》，第41页。

③ 同②，第62页。

尤为严重的是，由于运输船只紧缺，人为地打乱了部队调遣计划，影响了军事部署周转。如战事初起，当清军拟急速增援朝鲜牙山的叶志超部，而应飞快运兵的关键时刻，竟出现了天津招商局总办黄建光向盛宣怀所反映的这种情况：“刻奉戌刻函示，派‘图南’、‘飞鲸’明早速赴新城各节。然‘飞鲸’改议调装盛军，敝处初未得悉，故令其泊塘沽，但知后开一日以守原议。续奉戌正复示，属传知‘飞鲸’船主，将已上该船之人，速即改上‘高升’，遂即由德律风转饬遵照矣。承示已电吴乐翁，‘高升’装一千人，廿一开去，何吴管竟任兵勇仍上‘飞鲸’？致多此改船之周折也。”“刻接塘沽德律风，‘飞鲸’已装齐，统领属船主即开。惟前奉面示，因牙山无驳船，须一日开一船，现‘爱仁’刻间甫开，如何？”① 援军如救火，何况前线敌我双方刚接仗的关键时刻，部队运输必须分秒必争。但清军至牙山前敌竟然连“驳船”也派不出去，足见其影响军情的严重已达到如何程度。看来，由于西太后、李鸿章为首的清政府当权派没有实心备战，一到实际开仗，便遭到了现实的无情教训。

### 三

当战备工作一切就绪，到了临战阶段，战机选择得当与否，便成为作战双方的首要任务。这一点，中日之间也显露了极大的不同。日

---

① 《甲午中日战争》（下），第59—60页。

本的侵华国策是早经确定的，所以到临战时刻，他们是“万事俱备”，只待发布侵略命令就是了。日本外相奥宗光非常坦率地承认：“我从开始时就对朝鲜内政之改革並不特别重视，……至于我国朝野的议论究竟基于何种原因，已不必深问。总之，有此协同一致，不论对内对外，皆属便利。因此，我便想借此好题目，或把一度恶化的中日关系重加协调；或终于不能协调，良性促其彻底决裂。总之，想利用这一问题使阴霾笼罩的天气，或转一变而为暴风骤雨，或者成为明朗晴天，像风雨表那样表现出来。”① 所以，当他认为挑起侵华战争的时机已经成熟的时候，便指令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：“促成中日冲突为今日之急务。为断行此事，可以任何手段，一切责任全当自之，该公使丝毫不须内顾。”② 可见，日本政府在发动武装挑衅之前，政治、外交等等方面的合作行动也已准备完毕了。因此，无论陆军也罢，海军也罢，在已经作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，选择对他们最有利的时机发动进攻就是了。

先看海军，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的丰岛海战是日本挑起中日战争的序幕，但这一序幕是以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方式拉开的。早在七月二十三日，日本联合舰队已侵入牙山以南之群山浦，二十四日，日舰“吉野”、“浪速”、“秋津洲”三舰即在牙山准备进攻，而早在仁川守候的“八重山”、“武藏”、“大岛”三舰也立即开往牙山会合。此外，日本还专门派遣一艘舰艇监视中国的海军动向，随

---

① (日)陆奥宗光著：《蹇蹇》。伊舍石译。谷长青校。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，第29页。

② 王信忠：《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》，第232页。

窥探中国海军的行止。等到把中国海军的动向摸得真实后，便在二一五日清晨正式动手，突然对中国海军发起袭击，致使中国措手不及，完全丧失了主动权。

看看陆军，与丰岛海战一样，日本陆军根据大本营的指示，在发动丰岛海战的同一天清晨，由大岛义昌统率混成旅步、骑、炮、工等兵种共三千多人，由汉城出发，准备向驻牙山的清军突袭。但因丰岛海战打响了，引起了驻牙山清军聂士成与叶志超两人的警觉，他们深知牙山难守，决定改由两路分别御敌：一路拒守成欢，一路据守公州。大岛义昌也很狡猾，他深知清军已转移防地，也当即改变策略。先打成欢，于二一九日发动总攻，迫使聂士成“驰驟枪械弹雨中，往来策应，见军大乱，不得已率众溃围而出。”<sup>①</sup> 清军被迫退出牙山，使日军的突然袭击又一次得逞。

然而，面对着虎视眈眈、穷凶极恶的敌人，李鸿章却把自己的基点放在“避战求和”上。他认为：“两国交涉，全论理之曲直，非特强所能了事，仍望静守勿动。”、“日虽竭力预备战守，我不先开仗，彼谅不主动，此万国公例，谁先开战，即谁理诎。”<sup>②</sup> 因为他没有立足于积极备战，所以必然处处受到日本积极备战的制肘。李鸿章是一心指望居心叵测的帝国主义列强来“调停”中日战争，以制止日本侵略的，这个致命弱点，甚至他的对手陆奥宗光也看得很明白：“当

<sup>①</sup> 聂士成：《东征日记》，见中国史学会编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《中日战争》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六册，第10页。

<sup>②</sup> 《李文忠公全集》电稿，卷16，“寄朝鲜叶提督电”。

后来俄、英的调停中途失败，在平壤、黄海发生正式陆海战争时，他们的计划多陷于困境，以致在外交上和军事上均遭空前失败，无非由于他们自始即未立定脚跟，单恃外力援助，以图一时侥幸的缘故。”① 日本正是利用了李鸿章的这个弱点，才能在外交及军事活动中取得主动权的。

甚至当日本在朝鲜已经对清军发动武装进攻时，李鸿章还想唆使英国出兵压制日本，他清天津英国领事转告驻京公使欧格讷：“清欧转电外部。速令水师提督带十余铁快舰径赴横滨，与驻使同赴倭外署，责其以重兵压韩无理，扰乱东方商务，与英大有关系，勒令撤兵，再议善后，谅倭必遵，而英与中、倭交情尤显，此好机会，勿任俄著先鞭。”② 李鸿章这一招当然是徒劳的。他心急火燎，一厢情愿怂恿英国以军舰威胁日本，但自己手中却毫无实力，缺乏实力后的外交词令，英国怎么可能轻而易举地听信呢？再则，李鸿章企图用“俄著先鞭”来激将英国，然而英国也深知它与俄、日之间的三角利害关系，为了维护它自己的远东利益，决不可能仅仅凭李鸿章说了一句“俄著先鞭”，便轻率地把日本推到俄国一边去的。李鸿章如意算盘当然只能落空。

到了临战时刻，清军的贻误战机尤其严重，影响了整个战局的失利，一误再误，驻朝鲜前敌的电报局委员洪熙，从汉城致函盛宣怀说：“倭人布置仁川，汉城一路不遗余力，节节要隘皆屯重兵，裁埋地雷，韩京南山复支炮以待，汉城已在掌握，此刻我国即派兵来，已落后著。

① 《蹇菴录》，第52页。

② 《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》（一〇五三），卷13，第30页。

彼能以逸待劳，我兵已无进路。且倭人日夜搬运子药、军装，源源而来，大有久踞之势。中国若欲倚赖英、俄空言调处了事，断不足恃，缘即使决裂，彼已先谋胜算也。”① 这就充分说明清军的处处受敌军牵制，被动挨打，其主要原因在于坐失战机，甚至日军已动了手，清军却不敢及时还击。当时在刘公岛的提督丁汝昌就曾发电报给盛宣怀说：“倭先开炮击我兵船，且将汉城、仁川华商监禁，我亦当有以处之在。仍令在华倭人自如侦探，并不拦截倭商船，无此办法。应如何酌定夺？请定示知。”② 这是说，战火已经焚烧蔓延，而前线将领还在反复发电报等待李鸿章是否可以还击敌人的命令。可见贻误战机的罪魁祸首还是李鸿章。

＊ \* \* \* \*

回顾甲午战争的过程，可知中国失败的原因是早在战备阶段就出现的。不应有的疏略与失策，不过，虽然西太后、李鸿章是无心备战，实意调停，但中国朝野的有识之士及广大人民却并没有麻痹大意，忧时愤世，慷慨捐躯之辈大有人在，如主战派翁同龢、文廷式。

①《甲午中日战争》（下），第21页。

②《甲午中日战争》（上），盛宣怀档案资料辑录之三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页。